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诗词曲文精品集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集

伴读：古代雅文化的楷模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博士伴读——大系



团结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诗词曲文精品集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集

主编 张宏儒 罗书华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博士伴读一十一大系

团结出版社

伴 读

古代雅文化之楷模

王德保 著

原 文

王德保 选注

责任编辑 江 鹰
封面设计 先 河
版式设计 毕行之
责任校对 陆 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集/张宏儒,罗书华主编.-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4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博士伴读1+1大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诗词曲文精品集)

ISBN 7-80130-184-6

I. 唐…

II. ①张… ②罗…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唐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宋代

IV. I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6150 号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诗词曲文精品集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集

伴读:古代雅文化之楷模

张宏儒 罗书华 主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仰山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6 开 155 印张 388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30-184-6/G·42

全四卷定价:600.00 元

全十卷定价:1580.00 元

前言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有女一人兮，婉约而清扬。”一代有一代之文，而有价值的文学又总是超越时代而存在。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还有更为古老的《诗经》、《楚辞》、《史记》……哪怕隔了几百年、几千年，我们也能聆听到时间风尘下伊人的吟唱。也许正是乞灵于这渺茫的歌声，我们首先推出了十大文学绝唱：《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集》、《唐诗精品集》、《宋词精品集》、《元曲精品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

当前，大众文化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一方面，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种种的选本、注本、译文、赏析不断出现；尤其是明清小说，各种版本令人眼花缭乱。它们与现当代散文、诗歌、小说等等“精品”一起鳞次栉比地排列在书摊上、书店里。另一方面，明清小说还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演绎、续书、仿作与改编（尤其是在影视界的改编）。大众似乎总是以一种浮躁的心情，走马观花式地消费经典。人们注重的是故事的趣味性、情感的庸俗化，而传统文化的深层意蕴逐渐流失。在日益爆满的大众文化市场中，也许我们应该突出一点自己的特色。于是，我们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十余名文学博士或博士后、研究员、教授分别为唐宋八大家散文、唐诗、宋词、元曲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十个系列重新选注、校注，并撰写伴读。这十部伴读书的书名依次为：《民族心灵的绝唱》、《璀璨的明珠》、《自然的乐章》、《古代雅文化的楷模》、《大江东去论英雄》、《义胆侠风溉千秋》、《英雄交响曲》、《悠远的生命叙述》、《为漂泊的心灵寻觅家园》、《鬼狐世界的梦幻》。我们将这十部书合辑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博士伴读 1 + 1 大系》，奉献给读者。以原著加伴读，“1 + 1 大系”由此而得名。

这十大文学绝唱的选定，既考虑了传统一代有一代之文的说法，也考虑了文体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考虑了当代读者的接受心理。唐代以诗歌著称，宋代以词著称，元代以曲、明清以小说，中唐韩愈、柳宗元与北宋欧阳修两次古文运动，又推出了以古文著称的唐宋八大家散文。这里，诗、词、曲、文、小说几乎是清一色的近古作品，而且明清小说占了一大半。在这六部小说中，《聊斋志异》是继唐传奇以来文言小说的巅峰。其余五部或演绎历史兴亡，或传奇草泽英雄，或漫载神魔变幻，或描摩市井生活，或调侃儒林佚事，无不出神入化，各臻其妙，各自在不同的类型中代表了我国明代通俗小说的最高成就。每一部古典名著都是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伟大作品；每一部古

典名著都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各自具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个性特征,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每一部古典名著的情节结构,在以往传统小说的基础上都有新的重大的突破,创作了一个宏大完整而又自然的艺术结构;其语言艺术成就,更代表了中国古典文学语言艺术的高峰,作者往往只需用三言两语,就可以勾画出一个活生生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可以说,无论在思想内容上或是艺术技巧上都具有崭新的面貌,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永远放射奇光异彩,而且卓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亦毫无逊色。

中唐以来,市民阶层逐渐兴起,近古文学几乎都是文人与市民在不同层次上的双面渗透,但凡文人佳作,便在里巷小民中不胫而走。宋时,“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即柳永);而江南春岸折柳,秋江采莲,相伴而起的又往往是欧阳修的词作。明清的《水浒传》、《西厢》等更是号称人手一册,家弦户诵。便是更早,李白的许多诗词也是妇孺皆知。如今,大众于古典文学只怕睽绝得远了,而我们的“1+1大系”只不过是想让名著真正地重返民间而已。

每部名著之前所加的 20 余万字的伴读,是每位作者将本人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成果撰写成专著,欲引导、伴随读者轻松、方便、准确地去学习、研究该部名著。就仿佛游大观园,入正门,穿假山,迤迤而来。为什么这一处在这儿,那一处在那儿?彼此之间高低掩映、前后回旋的结构章法如何?哪一处宜雪,哪一处宜月,哪一处宜雨……作者这样设计,寓意是什么?在园与事,屋与人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就这样一层层叩问,既要细致,又要深入。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一如赏鉴仕女图,不仅要看到她曹衣似水、吴带当风的姿容;而且要透过那似喜似忧、若迎若止的眉目,读出她心底深藏的情愫。这就需要引入一种理性的思考,融批评入赏析之中。

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已经过了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近年来,在中西交汇下,研究界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现象:研究格局已从原来设置的中心向边缘移动,逐渐走向多元化;将作家作品作排列式的史的论述开始招致不满,以细读来把握宏观的研究越受重视;越出传统的樊篱,在研究方式上贯通中西,打破学科界限的尝试时而可见;围绕诸多重大问题发生了激烈论战,不少基本命题遭到了质疑与挑战……。

旧的常规研究已被打破,新的常规研究尚未建立。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一切既混沌,又嘈杂。唯一清晰的是,人们已日渐认识到社会、作者、作品、读者与批评,这五个要素缺一不可。批评者总是试图复原作品产生时的历史情境,以追究文本的终极意义;然而,复原历史,不论如何精确,也仍然是构设历史,文本意义也是相对的。批评永远是在一系列因素复杂运作下的历史与现在的双面对话。这一场对话也许首先是在哲学角度下,围绕个体的存在而展开的心灵与心灵的对话。近古文学交汇于文人与市民之间,在语言上,大都体现了典雅工丽与通俗自然相互渗透的审美风格;在意义上,又大都体现了人们徘徊在传统价值体系和新兴价值体系之间的两难境地。或者,对话只有在心灵与心灵之间展开,才能更好地体会古人的二元困境。

时值 20 世纪末,学术界许多领域都开始了世纪之交的回顾,试图在总结历史的基

础上展望未来。本丛书,力图构建一个规则化的体系,既有微观的伴读,又有宏观的把握;既有感性的审美,又有理性的思考;既偏重一方,又不废百家……,尽量保持一种能进能出、不即不离的心态,穿梭在社会、作家、作品、读者与批评这一复杂的关系圈中;融汇抑或陈述多方面的信息,在审美的伴读中;不仅开阔普通读者的视野,增加他的思维面度,而且围绕成书背景、作者情况、思想内容、情节结构、人物形象、版本源流、文化底蕴、艺术价值等为学习、研究者提供一些新资料、新观点和新成就。

鉴于以上种种,本丛书“原著”系列选用最佳版本重新校注。除六部小说外,其余四部诗、词、曲、文也尽可能选录公认的佳作。力图以新的角度、新的视野作充分的提炼,将真正的精品推荐给读者,与以往的选本相比,有以下不同:

第一,作品选录面极大的拓宽。比如宋词,以往所选录的作品大多在一百多首至三万多首之间,本次以词史的整体目光俯瞰两宋词,共选录 197 位词人的作品 1040 首,读者一卷在手,便可尽览宋词的五彩缤纷;

第二,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品全面录入。以往的作品,常常受编选者的审美趣味影响,或受社会风气的限制,选入的作品有一定的偏向性。本书则努力依据作品嬗变演化的本来面目,给予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作品以相对的地位,试图反映出我国古典诗、词、曲、文的概貌;

第三,重视二流作家和无名氏作品的择精去粗。一些作者在当时社会曾有很大的影响,声名远扬。只是后来由于风气的转移,或政治格局的改变,逐渐使得他们湮没无闻。其实,一些二三流作家也不乏有个别闪烁异彩的作品。尤其是大量无名氏之作,更有沉珠埋玉的遗憾。本书则以一定的篇幅,在反复选择的基础上,将其中的精华呈现给读者,以求扩大视野。

本丛书“伴读”系列的总原则是深入浅出,举重若轻。在此基础上努力体现出以下特点:

一、循循善诱的启迪性。启迪性是本丛书的出发点。既然是伴读,就仿佛面对静静聆听的读者——设身处地拟想他此时此刻的困惑和期待,然后一步一步地传道解惑,以使读者茅塞顿开。

二、平易开放的学术性。学术性是本丛书的基础和高品味所在。“伴读”首先必须是一本专著。开放性要求广采百家又不拘于成说,少作定论而偏于分析启迪,以使读者择善而从之;平易性要求避免冷漠、枯燥的学术八股文面目,代之以体贴入微、和风细雨的情怀,以求与读者的心灵相契合。

三、轻松优雅的可读性。可读性是本丛书“伴读”的生命。几乎在一开始,我们便力图设置一个诗意的阅读情境。所有伴读的整体行文都向生动活泼倾斜,借缪斯的指导,使读者逐步迈入神秘的文学殿堂。

四、脉络明了的体系性。这是本丛书学术性的内在规定性。一般说来,各册伴读都由以下几步构成:(1)引言——激发读者阅读兴趣;(2)价值篇——阐述作品文化意义;(3)解读篇(一)——按顺序分章分节分析文本;(4)解读篇(二)——以专题方式作

深入讲解;(5)拓展篇——介绍专业背景知识;(6)跋语或附录有关图表。所有篇目的设置始终围绕“帮助读者感受和理解原著”这个核心,并且篇目与篇目之间体现出由浅入深的走向。

早在明清时期,冯梦龙、李贽、陈继儒、袁宏道等人便感叹通俗文学在教化与动人上的巨大效应,认为“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因此纷纷参与通俗小说的改编、评点与推广。金圣叹更将《水浒传》、《西厢记》与《庄子》、《史记》、《离骚》、杜诗并称六才子书,推荐给自己十岁的幼子,也推荐给天下的“才子”们,作为学写文章的必读书。如今我们不过是在继续前人的工作而已,是追随在无数前人之后的执烛者。假如这一点微弱的烛光,能引导人们打开一扇扇古典文学的门窗,走入一个永恒的神秘的梦境,我们将十分地欣慰。伟大的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曾产生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这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汲取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编辑出版了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博士伴读 1+1 大系》,希望广大读者都能喜欢它。但由于时间仓促,人力和水平所限,书中仍然有诸多不足,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指正。

1998 年 3 月北京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诗词曲文精品集

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集

目录提要

前言 (1—4)

伴读部分 古代雅文化之楷模

目录 (1—2)

正文 (1—133)

跋语 (134)

原著部分

目录 (1—4)

正文 (1—254)

目 录

引 言

厚重的文化遗产	(1)
---------------	-----

解读篇(一)

一、文以载道与儒学复兴	
——八大家的正统色彩	(5)
二、唯美主义走向实用主义	
——审美与实用的背离	(11)
三、士族文化走向士人文化	
——科举制度的导向	(19)
四、官样文章的范式	
——奏章制诰的大手笔	(24)
五、应试文章的楷模	
——八大家的策论文章	(30)
六、官场应酬必备程式	
——序文、书信、墓志等	(38)
七、明道解惑的犀利武器	
——论说、论辨文章	(48)
八、抒情遣兴的文学散文	(54)

解读篇(二)

一、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古文的开拓之功	(62)

二、展示幽峭峻洁的人格	
——柳宗元散文的精神世界	(69)
三、文坛宗主的雍容气度	
——开一代风气的欧阳修	(75)
四、纵横上下 出入驰骋	
——议论风生的苏洵散文	(81)
五、典雅庄重 章法凛然	
——儒者气度的曾巩古文	(87)
六、拗相公的自我写照	
——王安石散文的政教意义	(93)
七、千古旷世奇才	
——集大成的苏轼散文	(99)
八、汪洋淡泊 一唱三叹	
——苏辙散文的风格	(108)

拓展篇

一、八大家的由来	
——选本流传情况及后人的评价	(113)
二、八大家的余绪	
——从明代古文家到清末桐城派	(115)
三、唐宋八大家的文化定位	
——古文是文学作品吗?	(117)

附录

一、唐宋八大家活动年表	(120)
二、唐宋八大家文集介绍	(128)

跋 语

我们如何接受这份遗产	(134)
------------------	-------

引言

厚重的文化遗产

当我们面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这些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唐宋八大家美仑美奂的散文,想到他们为历代士人所敬仰。那么他们在中国古代士文化的地位,仅仅因为他们在文学方面的杰出成就吗?有没有在文学以外的原因呢?

在古代传统的士人文化中,文学样式从来就有雅俗之分。就诗歌而论,四言的《诗经》,杂言的骚体,五言的汉魏诗,直至唐代格律诗的成熟,形成古典诗歌雅文化系列。较晚出的词,情况较为复杂,当它悄悄在民间出现时,十分寂寞,在士人中几乎没有问津者。相传由李白创作的两首词,至今仍有人怀疑其可靠性。到了中晚唐时情况要好一些,著名文人白居易、刘禹锡都写了数量不等的词作,不过其意义就在于他们是最早注意词这一被士大夫视为鄙俗的文学样式,与他们大量优秀的诗文相比,他们的词作也实在不足挂齿。宋代被视为词创作的黄金时代,其实,它成为被广大士人所认同的雅文化,仍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所谓“诗庄词媚”之说,实际上依然将其摒弃于雅文学之外。北宋时期,如柳永、晏几道等专以词名世的词家,始终落拓不偶,终生沉沦下僚,颇类似明清时期小说家的处境。那些在文坛上执牛耳的文章巨公,如欧阳修、苏轼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词人,但是词创作,只是他们遣兴吟咏之余事,其重要性远不能与其诗文创作相提并论。正是由于他们的参与,或者说由于他们的认同,词才逐渐在士大夫中引起重视。这形成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欧、苏诸人,并非因其词作在当时文坛取得盟主地位,但因其盟主地位,却使词在士人中得到广泛吟咏。虽说它仍然不可与传统的雅文学——诗文,争强斗胜,但它总算在士人文化圈子中取得一席之地。与其相比,后起的散曲,更是命运多舛,直到清代它仍然没有进入雅文化的殿堂。

在以士人为文化中心的封建时代里,士人的价值观念、生活规范,往往就是当时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价值系统。当然这种观念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并非固定不变。譬如,魏晋士人放浪形骸,任诞嗜酒的生活方式,为循规蹈矩、崇尚吏务的宋人所不能接受。但是这种生活方式在当时很是时髦,阮籍、嵇康等人成为时人纷纷仿效的楷模。虽然各代士人的某些观念、规范,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不同的变异,但有一点是不变的,这就是士人作为文化精英的身份。士人为何能保持这一特殊身份呢?这由于在以官本位为价值标准的社会里,士人是组成国家机器、官僚机构的主体,跻身于官员之中,是社会各阶层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万钟粟”,“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闻”,便是旧时代读书人

走读书当官道路的形象化描述。名誉、地位、金钱、美女在任何时代都是好东西,虽然历代道家羞于启齿言及这些“俗不可耐”的劳什子,但这并不妨碍大多务实士人将其作为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

在官本位价值体系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当官无疑是获得这些实在利益的唯一途径。自然人人都想当官,但并非人人都能当官,当官有当官的途径,亦有当官的规矩。在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确立,规定了士人要当官谋取富贵必须走科举应试之路。当唐太宗眼见众举子进入科场,洋洋自得地说:“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科举制度的确是拢络人心、网罗豪士的有效手段。倘若从士人角度而言,未尝不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士人们寒窗苦读,从来将其作为谋取富贵的唯一途径,确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气概”。如果说,科举考试是帝王们精心布置的罗网的话,那一定是天底下最美丽的罗网,自投罗网者不计其数,而且他们以能投入罗网中感到自豪。

中进士之后的士人,是读书人仰慕的对象。《儒林外史》中描绘出各等人物趋炎附势的丑态,对官员的敬畏,其实就是对权势的崇拜。范进在中举之前,贫困潦倒,被人嗤笑;一旦中举,便身价百倍。他的举人身份,意味着将来有可能掌握权势,获得财富,这些东西都令普通人艳羡不已。希冀科场得意,考取功名,自然要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具备作为官员而应有的基本技能。要提高文化水平,掌握基本技能,一是向书本学习,这就是所谓的十年寒窗;再是趋同于官吏阶层的生活情趣,认同其价值观念。官场自有一套游戏规则,比如通行的礼节,应有的应酬,诗词唱和,书信往来等等,都有颇为严格的范式,要想在官场混得有滋有味,自然必须恪守这些规矩。

诗文之所以被士人阶层视为雅文学的典型样式,是因为这两种文学体裁,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成为士大夫阶层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官员们不管其文学才情如何,写点五七言的古、近体诗,一般说来不会有多大问题。混在官场,必要的应酬是不可避免的。比如,上司显贵的寿庆,同僚之间的宴饮,节日佳辰的聚会,朋友亲戚的离别,都免不了要吟咏唱和,这在官场被认为是很高雅的事情。官员不会填词、作曲、写小说,对其仕途的进展,不会有什么影响,假若他不会作诗,难免受到讥嗤,他在仕途上的前程无疑很不乐观。影响所及,那些在野、而略有名声的诗人,在社会上亦受到极大的尊重。宋朝时隐逸诗人魏野、林逋当时在士人之中极有声誉,也受到皇帝嘉许。魏野去世,太宗特下诏予以褒扬;林逋之卒,英宗加谥号为“靖和先生”,这无疑是极为荣耀之事。文学成就远高于他们的柳永、晏几道则无此幸运。如果说作诗是官场应酬的需要,那么,写文章则是当官的必备技能。在科举时代,唐人重诗赋,宋人重策论,明清考八股。即使在唐代,策论仍然是必考科目。宋以后,写文章是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技能。通过考试之后,要想做清要而又升迁迅速的朝官,写一手好文章是朝廷择人的首要条件。中唐之后,翰林院是皇帝的秘书班子,负责起草皇帝敕令、朝廷文告的翰林学士往往被看着是未来宰相预备人选。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因文名而掌知制诰之职。虽然他们在仕途的境遇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因写得一手好文章,而官居显要。就其实用性而言,诗自然不如文。诗作得好,固然能提高社会声誉,但对职务的晋升,没有太大的意义,而文章写得好,则使晋升机会大大提高。宋以后,进士出身的宰相,大抵都写得一手好文章,这种状况绝非偶然。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自宋以后,八大家的文章为什么会成为普通士子日

常必修的功课,精心研习的学问。所谓“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这在士人中广为流传的颇为通俗的谣谚,倒也朴素而生动地揭示出时人研摩八大家文章的心态。回顾一下文学史,诗歌流派常有宗唐、宗宋之争,而古文的创作,从来都是唐宋八大家连称。这不是因为八大家的文章,只有共性没有个性,而是因为他们文章的实用性价值对普通士人来说的是相同的。

在士大夫雅文化圈子内,八大家之文无疑成为一种高悬的标准,仿效的楷模。这其中有关文章学的意义,凭心而论,他们的创作,的确将先秦以来奇句单行的古文的实用功能、表现能力发展到极至,无论叙事、抒情、描写,还是论说、文告、公文都运用自如,文彩斐然。在文化史上也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提供了后世士人举子作文的范本。从明代的古文家唐顺之、茅坤,到民国初年的桐城派殿军林纾等人一直都倾心推崇唐宋八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如果我们仍然生活在旧文化的氛围中,很可能今日的莘莘学子,仍然以八大家文章为必修功课,以其作为评判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他们对中国文化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如果仅从美文的角度来看,散行的古文绝对比不上整饬优美的四六骈文。像庾信徐陵等人的骈文,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王勃的《滕王阁序》等篇章都是极其优美的文学杰作。辞藻华美,音韵和谐,对偶工整,行文流畅,可以说,优秀的骈文作家将汉语方块字的优美性发展到极至。但是,优美的骈文并不能取代简朴的古文。自魏晋时期到中唐,骈文一度成为文坛的主流文体,后来由于遭到推崇古文的韩愈、柳宗元的强烈反对,古文开始在文坛上占上风。古文在文坛真正成为不可撼动的霸主是在宋代,欧阳修与苏轼先后主盟文坛,追随者风从云集,盛极一时。命运不济的骈文纯粹成为文人争强斗胜、炫耀才学的文体,已从时兴文体成为消闲的器具。并不优美的古文战胜了非常优美的骈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古文实用,而且简朴易学。而骈文的纯美倾向,写作技巧的过分讲究,使一般士人望而却步,非才高学富之士,很难讨好。骈文成为古文之附庸,在上层官场中,在士人阶层里,就不会有很大的市场,它对仕途没有较大影响,加上骈文确实难写,所以宋之后,写骈文的人日趋减少,再也没有出现像《滕王阁序》如此杰出的篇章。

探究古文与八大家的关系是理解他们在文化史和文学史地位的关键。如前所述,古文作为雅文化之大宗,使他们的身影笼罩了文坛千余年,甚或可以说,他们的古文创作已成为当时文化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古文主流地位的确立,与他们卓越的文学成就有必然关系。我们翻阅他们的文集,又把他们的文章与同代人或后世古文家相比,就会发现,这些人绝非浪得虚名之辈。又不得不佩服最先将其并称的明初古文家唐顺之、茅坤等人的眼力。

中国封建文化在唐宋两朝可称极盛,文学艺术各方面都取得了后世难以为继的成就。尤其在士大夫传统的雅文化领域里,后人无法与其一争高低。诗歌、散文的创作,几乎已臻绝境。诗坛上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轼、黄庭坚、陆游等,文坛上的八大家,都是高不可攀的星辰,直让后世那些恃才傲物,自命不凡的才子们望洋兴叹,自愧弗如。并非千余年来,文人的才情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也不是天底下所有的好诗或好文章都被唐宋文人写绝了。而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已被后世视为范式,而这种范式是不可超越的。正像我们偶而或许能说出一两句精彩得不比《论语》中的某些格言逊色的高论,但我们的言论能与孔夫子的言论相提并论吗?八大家的文章,在当时的文化形态下,就是这样一种为后人不可超越的范式。人们可以研习、可以模仿,但就是不可超越。事实上,在后来近千年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古文创作方面,无人可与八大家所媲美。

当我们走近唐宋八大家,欣赏他们所创造的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时,我们应该看到他们代表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曾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居于主流地位,也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象征了中国古代文明。随着这种旧的文化形态的消亡,八大家原有的显赫地位,今天已不复存在了,但其文学创作的艺术魅力至今犹存。而且,通过阅读他们的文章,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理解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形态。

解读篇(一)

一、文以载道与儒学复兴

——八大家的正统色彩

中国历史在结束春秋战国多国纷争的状态之后,短命的秦王朝,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大的作为,便土崩瓦解了。汉代统治者在吸取秦帝国飞速灭亡的基础上,在一位名叫董仲舒的绝顶聪明的儒生倡议下,“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此儒学从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思想。孔子成为圣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也成为中华民族中对世界文化影响最大的人物,在这方面,孔子是无与伦比的。儒家的正统地位一经确立,其著作成为在士人中成为无可置疑的经典,熟读这些经典是士人仕进的主要功课。尤其在科举时代,儒家著作是考试的主要内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儒生已是读书士人的代名词。皓首穷经者,代不乏人。所谓:“一心只读圣贤书”,便是读孔孟之书,读儒家经典。

一般说来,儒学对时代的影响,具有相对性。与佛教、道教相比,它无疑更具有权威性,在绝大多数时间内,它处于正统地位,即使信奉佛教或者信奉道教的皇帝,如佞佛的梁武帝,信奉道教的唐朝皇帝都不敢否定儒家的正统地位。但这不是说,儒家作为一种极复杂意识形态,就不会有信仰的危机,或者不会遇到挑战。中国古代治久必乱,乱久必治的循环过程,使得儒学的发展也呈现出波浪起伏的状况。在统一的朝代,往往是儒家地位加强,其它教派无法与其较争锋。如汉代儒学占绝对压倒优势。东汉明帝时期,佛教已传入中国,虽然有几位皇帝信佛教,但他们只是将其作为能赐福于自己的神,并非作为一种信仰。丝毫也不影响儒教的统治地位。但是在动乱时代,儒家的境遇就没有如此幸运,在社会正常秩序被冲击的同时,正统的儒教也遭到其它教派(主要是佛道二教)的挑战。东汉之后是长达四百余年的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正是儒学相对衰微时期。杂糅儒家与道教的玄学,在当时的思想界占统治地位,汤用彤先生在评论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王弼说:“至若辅嗣著书,外崇孔教,内实道家,为一纯粹玄学家。”(《魏晋玄学论稿》)又说:“魏晋教化,导源东汉。王弼为玄宗之始,然其立义实取汉代儒学阴阳家之精神,外杂以校练名理之学。探求汉学蕴摄之原理,扩清其虚妄,而折衷于老氏。于是汉代经学衰,而魏晋玄学起。”

在文学史上有趣的现象是,与儒学的衰微同步,奇句单行的秦汉古文亦随之衰落,而取而代之的是辞藻华美的骈俪文。自西晋骈文成熟以来直到隋朝,骈文无疑是在文坛占统治地位的文体,而这一时期正是儒学衰微时期。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这一时期,士人对孔子这一圣人仍然是顶礼膜拜,不敢造次。儒学的圣教地位也是不可动摇的。王弼注《周易》,依然将

其作为儒家经典来注,但只是在注的过程中,贯穿了道家思想。《周易》这本书也被改造成一本道教著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当时的门阀制度,士人入仕凭借其门第高低,而不是儒家经典的熟悉的程度,儒学再也不是仕途上的敲门砖。在西晋初期,司马氏也提倡儒学,但显然未得到士人认同。如阮籍讽刺儒生说: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

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咏怀》六七)

这里对口是心非,矫揉造作的假道学讽刺得十分深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礼教在维系人心方面已经没有很大约束力了。在这种状况下,作为载道器具的古文,被新兴的骈文所取代本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经过魏晋南北朝四百余年的战乱之后,历史又走了一个循环,由隋统一了天下。统一的王朝便需要大一统的思想,隋文帝是个励精图治的帝王,他力图改良政治,其中重要的步骤便是改良文风。他曾下诏:“公私文翰,并宜实录”。这实际上是对花里胡哨的骈文不满,那种照直说的文风,其实就是提倡平实的古文。隋朝存在时间很短,炀帝的倒行逆施,很快引起天下大乱,隋朝随即灭亡。关陇贵族首领李渊趁乱崛起,建立起强大的唐帝国。唐朝统治者在开国之初,便注重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提倡尊孔崇儒。杰出的君主李世民完全懂得儒学传统在维系民心的作用。《旧唐书·儒学传序》云:

(武德三年)太宗讨平东夏,海内无事,乃锐意经籍,于秦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属杜如晦等十八人为学士,……及即位,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学士,令更日宿值。……贞观二年,停以周公为先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以宣父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太宗又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

在武力统一中国之后,长治久安依靠的是所谓的文化德治。从马背上得天下,自然不能在马背上治天下,唐太宗很清楚这个道理。他在夺得政权之后,重用的是一批饱学的文臣,又重儒家经典的整理和注释,组织人员编定《五经正义》,要求天下学者以此为定本,作为标准教材。这明显有统一思想的目的。这种作法的结果应当说是有成效的。大唐帝国盛极一时,与这种国策是有关系的,同样显示出,孔孟之道作为统治术的一部分往往是有效能的。在提倡儒教的同时总是伴随着提倡质朴的文风。初唐文风承袭齐梁余绪,这对于统一的帝国来说颇为不谐调。因此就有人因卫道的原因,针砭时风,提倡与载道相适宜的文体。在武后朝先有初唐四杰,如四杰之一的杨炯在为王勃文集作序时说:“尝以龙朔(高宗年号 661-663)初载,文声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其志。”王勃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儒家学者,他的祖父王通是隋朝大儒,从小受过良好的正统教育,杨炯在这里所说的“用光其志”,应该是振兴儒学的志向。那么他对当时文风的不满原是指诗歌和散文两方面。尔后的陈子昂反对齐梁文风,也与其改良政治的志向有关。陈子昂具有突出的政治才能,又是著名的文士,韩愈称:“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显然也包括他在散文方面的创作成就。他的诗歌和散文都有载道的倾向,并非以

文彩著称于世。就是在这些卫道之士的不懈努力之下,才有盛唐时期的文学繁荣。

我们再来看看八大家生活的时代正是儒学振兴的时代。八大家中韩愈年龄最长,生于八世纪中叶(768),距公元755年发生的安史之乱,相差十三年。以苏辙年齿最少(1039-1112),殁于十二世纪初,距北宋灭亡(1127),相差十五年。这三百五十年间,唐宋是两个统一的文化高度发达的王朝。韩愈、柳宗元他们生活于中唐时期,此时的唐王朝经过安史之乱这一劫难之后,国力衰落,中央集权遭到割据一方的藩镇挑战。元和年间,唐宪宗重用主战的宰相裴度等,对藩镇用兵,结果一度将藩镇的权力收回,国家又呈现出统一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面,儒学的复兴,意味着士大夫阶层对动乱后维护统一的希望。

唐朝是一个气势恢宏的强大帝国,自太宗以后的历代君主如武后、玄宗,在提倡儒教的同时,对佛道二教并不排斥。高宗皇帝李治以老子李耳为唐皇室的始祖,奉为玄元皇帝,道教一时几乎成为国教。武则天为了夺取李氏的天下,又抬出佛教来对抗道教,自称是弥勒佛转世,全国到处建佛寺塑佛像。政治见识卓越的陈子昂对此事大为不满,在《感遇》一九中说:

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黄屋非尧意,瑶台安可论!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
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夸
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子昂在此仍是以儒家的圣王尧作为一种参照系,与崇尚佛教的当代皇帝对比,显然希望皇帝效法儒家的圣王,爱惜民力,所持标准乃是儒家的。对武则天佞佛行为显然不满,其卫道目的也是很明显的。佛道两家由于卷入政治斗争,受到统治者的鼓励,因此在初、盛唐时期,虽然儒家的正统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但佛、道二教,在社会上尚很流行。尤其在安史之乱之后,佛道二教的势力有扩张之势。唐代宗大历十三年,都官员外郎彭偃上疏议佛、道二教说:

今陛下以维新之政,为万代法,若不革旧风,令归正道者,非也。当今道士,有名无实,时俗鲜重,乱政犹轻,惟有僧尼,颇为秽杂。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国去圣日远。空门不行五浊,比邱但行粗法,爱自后汉,至于陈隋,僧之教灭其亦数四,或至坑杀,殆无遗余。前代帝王,岂恶僧道之善,如此之深耶?盖其乱人亦已甚矣。……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广作危言险语,以惑愚者。一僧衣食,岁计约三万有余,五丁所出,不能致此,举一僧而计天下,其费可知。陛下日吁忧勤,将去人害,此而不救,奚其为政?

彭偃与韩愈是同时代的人,当时朝臣有一批人都向皇帝提议删汰道士、僧尼。这实际上显示出,佛、道二教势力大张,他们享受不纳捐税不服劳役的特权,由于人数众多,已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除此之外,佛道二教兴盛,也是对儒教的公然挑战,正如彭氏所谓:“被于中国,去圣日远。”圣教的地位受到挑战,其维系人心的力量将会削弱,这在藩镇割据的中唐时期,无疑是一种危险的政治倾向,自然引起一些卫道的士大夫忧虑。攘斥佛老,几乎是当时正统士大夫的共识。以反对佛老而言,当时最有影响的人物,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人物就是韩愈。在散文创作方面,形式华美的骈文在文坛上占上风。

苏轼在评价韩愈在振兴儒家的功绩时说:“自东汉已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韩愈自然是文章巨公,而且他还是唐宋儒学复兴的关键人物。苏轼将其文道并称,显然是注意到他在振兴儒学的重要作用。历史上两次成功